

積極援助中國共產黨領導的

抗日武裝和根據地

一、「哪裡最需要幫助就幫助那裡」

一份辛勞，一份收穫。宋慶齡和「保盟」千辛萬苦的努力，終於獲得豐碩的成果。各方面的捐款和物資源源而來。但是，接收、分配與使用這些捐款和物資，還要克服無數的困難，進行種種嚴重的鬥爭。而且，這些困難和鬥爭，甚至比募捐還要嚴重得多。

首先，使國外捐獻的物資要安全無損地運送到「保盟」手中，不僅要躲過日本軍隊的封鎖和截擊，還要防止國民黨官僚機構貪官污吏的侵吞。這種鬥爭必須勝利，否則將動搖國際友人援華的信心。所以宋慶齡很重視國外物資的接運工作，總是親自過問和策劃。

抗戰初期，「保盟」還可以利用上海的租界、香港、廣州等港口，接運援華物資。後來敵人佔領了沿海的港口和內地重要的交通線，「保盟」只有利用滇越一線，進入中國的廣西境內。可是，當時海防港的法國殖民者經常刁難援華物資的通行，「持一種令人簡直不能相信的惡劣

態度」。⁸⁷大批醫藥用品和野戰醫院用的醫療器械在海防港的倉庫運不出來。「保盟」曾派兩名外國醫生前去交涉，仍然毫無結果。

宋慶齡得知後，特派王安娜前往聯繫。她認為王安娜「能說法語，又是婦女，辦起來可能會順利些」。⁸⁸於是，王安娜作為「保盟」代表，率領二十名新加坡歸國的華僑司機前去。果然一切順利。她感慨地說：「兩名男子早先專程到海防來，未達目的。而我這個婦女，和法國的海關官員打交道，一定能取得良好的結果。——這是孫夫人的推理，這個推理現在已證明是正確的了。但有一點是孫夫人想錯了的。她認為我的法語定能發揮作用，實際上德語更有用處。這是因為在海防的法國官員，全都是亞爾薩斯（阿爾薩斯）地方出生的人。」⁸⁹

王安娜率領滿載而歸的車隊駛向中國境內，他們經過崎嶇不平的公路，歷盡重重困難和障礙，終於到達目的地。宋慶齡非常高興這條新開闢的路線，她向國外朋友宣佈：「現在，我們已經發現了並且已經利用了新的途徑。捐贈者可以肯定他們的捐贈能像以前一樣及時到達目的地。」⁹⁰

後來，這條路線上的中國要隘又被敵人佔領，只能通過河內——雲南和以後新修的滇緬

87（聯邦德國）王安娜：《中國——我的第二故鄉》第二百八十一頁，三聯書店一九八〇年版。

88 同上。

89 同上。

90 宋慶齡：《我們的第一年》，載《永遠和黨在一起》第十一頁，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公路。但不久，一九四〇年夏天，向希特勒投降的法國維希政府封鎖了印度支那的入口；英國政府由於搞遠東慕尼黑，向中國施加壓力，也關閉了滇緬公路。經過宋慶齡及國際上正義力量的鬥爭，英國政府才在十月重開關閉三個月之久的滇緬公路。《新聞通訊》對此作了重點報導，告訴國外的朋友們：「滇緬公路重開了！」並指出：重開滇緬路是世界人民聯合抵制侵略者的威脅的有力象徵。⁹¹公路重開的第一天，就有五百輛卡車，載著約一千五百噸藥品和戰爭物資，通過了邊境。

宋慶齡和「保盟」的一項重要工作，是經常向國外捐助者報告他們所捐物資的運輸情況，以動員國內外更多的人關心和支持「保盟」的工作，與各種阻撓和破壞活動鬥爭。

對於所得捐款和物資的分配，宋慶齡說，「保盟」的原則是：「哪裡最需要幫助就幫助那裡！」⁹²

「保盟」成立時就明確宣告，要改變援助物資「在我國分配時，既未能根據最急需的需要，又未能按照捐獻人的意見做到合理」的狀況。據此，宋慶齡向捐助者經常宣傳：「保盟」是一個民主的無黨派的救濟機構，保證兩個主要目的：一是，「使國外友人得知中國戰鬥的進展以及中國傷患、孤兒和難民的最大需要」；二是，「純粹的醫療、救濟和教育的目的，把募集

91 《新聞通訊》第二十二期，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一日。

92 宋慶齡：《救濟工作和政治——答宋子文先生》，載《永遠和黨在一起》第二十五頁，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的資金和物資，分發給任何需要最大的中國作戰部隊和平民」。⁹³

宋慶齡特別強調「保盟」的「救濟工作是建立在統一戰線的基礎上」，因此堅決主張「中國各地區應該享受救濟待遇的同等權利」。⁹⁴

根據上述原則和目的，宋慶齡對接受援助者一視同仁。不論是在國統區還是在邊區和敵後抗日根據地，「保盟」都為傷殘人提供醫療服務，為無家可歸的人興辦工業合作社，為流亡的大學生開辦學校，為戰爭中無數流浪兒童建立孤兒院等等，這在一九四〇年四月公布的「保盟」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度帳目收支表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在這個表中，「收入」一欄內的具

港幣收支表⁹⁵（單位：元）
（一九三九年一月——一九四〇年二月）

項目	收入	支出
上年度餘額	33,536.24	
國際和平醫院	40,159.19	46,878.46
紅十字醫療救濟會	11,449.27	9,639.80
八路軍	20,340.82	27,411.50
新四軍	12,155.10	14,990.83
中國工合	27,132.20	30,616.69
戰災孤兒	3,054.91	5,789.47
難民救濟	4,033.17	5,511.03
魯迅紀念學校	12,792.32	9,800.00
抗日軍政大學	676.06	923.87
一般	28,303.08	10,636.72
宣傳	2,906.18	7,396.16
銀行結算		26,942.01
總計	196,536.54	196,536.54

93 宋慶齡：《救濟工作和政治——答宋子文先生》，載《永遠和黨在一起》第二十五頁，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94 同上。

95 《保衛中國同盟報告》第一百至一百〇三頁，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

體單位如「國際和平醫院」等，是指捐款人指定捐助的數額。「支出」一欄是指這些單位實際得到的援助數額，其差額則是由「保盟」調整的。

從這個表中看到，「紅十字醫療救濟會」，主要是對國統區的捐助；「國際和平醫院」、「十八路軍」、「新四軍」、「魯迅藝術學校」、「抗日軍政大學」，是對共產黨解放區和根據地的捐助。「中國工合」、「戰災孤兒」、「難民救濟」，則兩種地區都有。

毋庸諱言，宋慶齡把「保盟」援助的重點放在共產黨領導的抗日部隊和根據地內，其次是中國「工合」，因為「那裡最需要幫助」。

二、給八路軍和新四軍「雪中送炭」

宋慶齡本著「哪裡最需要幫助就幫助那裡」的原則，一視同仁地給全國各方面提供援助。但是，由於客觀情況存在著很大的差別，再加上國民黨頑固派又人為地擴大這種差別，於是就形成了「保盟」援助的重點是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

蔣介石「聯合抗日」是被迫的，他的本意是「溶共」，企圖在「服從」國民黨中央政府和中央軍委命令的名義下，吃掉陝甘寧邊區和中國工農紅軍。因此，雖然在抗戰初期，南京政府曾撥過一些軍餉給八路軍和新四軍。但是隨著戰事的發展，當他們看到非但達不到「溶共」目的，而且共產黨在敵後抗日鬥爭中日益壯大時，就不但斷絕對八路軍和新四軍的供給，蘇、美、英等國提供的援助也不分給共產黨一份，而且還配合日偽軍與共產黨部隊大搞摩擦，派

遣幾十萬精銳部隊包圍封鎖陝甘寧邊區，甚至發動一次次大規模武裝進攻，企圖困死各個抗日根據地，消滅八路軍和新四軍。

在這種形勢下，共產黨一方面要以民族大義為重，努力維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另一方面又必須針鋒相對，粉碎日、偽、頑的圍攻。因此，它所面臨的艱難困苦，只有到過根據地的中外友人才會瞭解並感到震驚。

另外，與國民黨軍隊相比，共產黨軍隊所受的待遇更是極端不公。國民黨軍隊不僅有政府給軍餉，還有中國紅十字會、傷兵之友社等各種實力雄厚的官方援助機構的關照。紅十字會本來應對一切抗日部隊一視同仁，但是從一九四〇年春季以後，由於國民黨政府反共行動的升級，也不再進行籌募遊擊區經費的工作了。

對於這種情況，宋慶齡瞭若指掌，深感不平。因此，她不得不把這種真實情況告訴國內外朋友，呼籲支援遊擊隊戰士。一九三九年，在香港慶祝國際婦女節集會上，她說：

「現在我要你們想一想我們英勇的遊擊隊戰士們，他們不僅面對同樣的情況，而且能夠不顧一切，繼續不斷地打擊配備優良的侵略者。這些英雄們不僅用老式的步槍、有限的彈藥、土制的手榴彈、鐮刀、刀劍、棍子和拳頭，在跟具有各種現代戰爭的技術配備的敵人作戰；不僅是連最起码的醫藥供應都沒有；而且，由於不甘心做奴隸，他們離開了自己的田地和工廠；因此，他們迫切需要衣服和糧食……因此，我們自己的責任也隨著加重，我們需要擴大

外來援助的數量與範圍，以幫助這些無名英雄。」⁹⁶

宋慶齡還一再聲明，在這種情況下，根據「保盟」公正的分配原則，給八路軍、新四軍以較多的援助，是完全光明正大、義不容辭的。一九四一年，她說：「因為我們曉得，在全中國，遊擊區是最缺乏資金和醫療物資的；又因為我們相信，遊擊戰和動員前線地區人民是中國抗戰的重要因素。所以我們在過去特別努力幫助中國北部和中部遊擊區的傷病員和戰爭犧牲者。這不只是我們自己的主意，許多國外的中國朋友，也明白表示希望把他們的捐贈的款物用在這些地區……當然，如果捐贈者要把捐贈品送到別的地區，我們也隨時傳遞的。但是我們始終特別關心中國遊擊隊的需要。」⁹⁷宋慶齡並且指出，如果「保盟」不給那些最缺醫少藥的遊擊戰士帶來現代醫藥援助，那麼，「它將被完全忽視」。⁹⁸

一九四三年，宋慶齡用更明確的語言，對國外朋友解釋說：「為什麼要特別提到邊區呢？我們是否把邊區的要求放在其他中國地區和其他中國軍隊的要求的前面呢？不，我們並不如次。我們所以把重點放在遊擊區，是因為他們雖然牽制了並且仍在牽制著日本在中國幾乎一半的兵力，但是他們已經有三年沒有得到過任何武器和金錢的援助，以及與我們的工作特別

96 宋慶齡：《關於援助遊擊隊戰士的呼籲——在香港國際婦女節集會上所作的演說》，載《宋慶齡選集》第一百四十一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版。

97 宋慶齡：《救濟工作和政治——答宋子文先生》，《永遠和黨在一起》第二十九—三十一頁，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98 同上。

有關的醫藥援助……國內政治的封鎖使他們沒有醫生、外科器械和藥品；甚至由國外友人送來的，他們也得不到。我們並不要求給他們優先待遇，而是要求平等待遇。」⁹⁹

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宋慶齡領導「保盟」在抗戰期間「雪中送炭」，給八路軍、新四軍很大的援助。

從遺留下來的資料及當事人的一些回憶看，「保盟」對八路軍、新四軍援助的大致情況是這樣的：

一九四一年六月，宋慶齡在維護「保盟」支援解放區工作正當性時透露：「我們幫助遊擊區建立了四個國際和平醫院，在陝北設立邊區孤兒院，在南方幫助新四軍建立醫務所。我們為華北荒山上的遊擊隊戰士呼籲毛毯、手套和其他慰勞品，因為在中國所有的戰線，沒有任何地區比這裡更需要這些東西。我們為西北邊區住在窯洞裡營養不良的兒童索取藥品、維他命丸和護理經費，因為我們知道在中國沒有其他地方的兒童像這裡的戰爭孤兒一樣靠這樣稀少的一點食物活著。」¹⁰⁰

一九四三年六月，在八路軍談判代表護送下，「保盟」曾把一噸重的物資，運進遊擊區，其中有紅十字會和私人援助的寶貴外科手術器械和磺胺藥品。¹⁰¹

99 宋慶齡：《給中國在海外的朋友們的公開信》，載《宋慶齡選集》第一百六十八、一百六十九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六年版。

100 宋慶齡：《救濟工作和政治——答宋子文先生》，載《永遠和黨在一起》第三十頁，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101 參見《從香港到重慶》，載《永遠和黨在一起》第四十一、四十二頁，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宋慶齡和「保盟」對延安及八路軍支援最大的是國際和平醫院的創建。

陝北地區長期以來是中國最貧瘠落後的地區之一。中國工農紅軍到達時，那裡沒有一所醫院。抗日戰爭爆發後，隨著傷病員的增加，缺醫少藥的問題日趨嚴重，引起宋慶齡的注意。自從一九三六年派馬海德去延安以後，她一直關心那裡的醫療工作，每次對海外朋友呼籲援助，都把這個問題放在首位。

當時，國際和平大同盟世界代表大會回應宋慶齡的呼籲，作出了援華決議案，其中包括決定在中國建立國際和平醫院。一九三八年九月，英國援華委員會據此決議，向「保盟」提供四千四百五十英鎊的建院費，並派委員會代表兼倫敦《每日新聞》特約通訊員何登夫人來華與宋慶齡聯繫，協助籌辦國際和平醫院。何登夫人還護送來一批英法等國婦女捐贈給中國的藥物。於是，就在當年年底，在剛剛開闢的八路軍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建立了第一座國際和平醫院。第一任院長就是白求恩。後來在共產黨的要求下，在延安及各個抗日根據地先後建立起十一所國際和平醫院、四十二個前方流動醫療隊和八個醫科學校，其中有延安的國民模範醫院和中央醫院、山西的五臺山醫院和晉南的戰地醫院等，形成了一個效率很高的醫療網，為北方抗日根據地的軍民服務，為八路軍抗戰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而國際和平醫院這個醫療網的建立、鞏固及發展，是與宋慶齡嘔心瀝血、堅持不懈、不斷的關懷和大力支持分不開的。

從上列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保盟」收支表看到，「保盟」對國際和平醫院提供的經費

最多，這些經費主要來自國際友人及華僑的捐助。另外，宋慶齡還多次在香港直接為國際和平醫院募捐。

由於當時中國及遠東購買藥物困難，大部分國外的捐款就用於在當地購買藥品、醫療設備、疫苗、繃帶等。這些物品來華後，盡量直接運往根據地，但後來由於交通及國民黨阻撓等原因，只得先存放在香港「保盟」的倉庫裡，逐漸積累，數量很大，曾達到夠根據地醫院數年之用的程度。宋慶齡經常親自組織「保盟」工作人員，到倉庫中對藥品及設備進行分類整理，編寫細目，集中裝箱，並派人護送等。

宋慶齡對國際和平醫院的關懷是無微不至的。馬海德回憶說：「她給我們送來的物資中，還包括盤尼西林（當時世界上一種新藥，即後來的青黴素）的配方和原料。當時我們只能生產品質很差的，僅能供外敷用的盤尼西林。但是，在那種困難的情況下，這也成了我們治療炎症、胸腔化膿和骨髓炎的非常寶貴的藥品。」¹⁰²

一九三九年，王安娜從海防港接回的那個車隊中，有一輛英國工業家約翰·桑尼克勞夫脫通過宋慶齡捐贈給國際和平醫院的大型救護車。它大小像公共汽車，車上燈水齊備，還有手術床和七張病床。廖夢醒回憶：「送車證給宋慶齡同志那天，我們都到場觀禮，許多記者來採訪，報紙紛紛刊登消息照片，引為一番盛事。」¹⁰³這輛車，宋慶齡安排由「保盟」工作人

102 馬海德：《偉大的形象親切的友誼》。

103 廖夢醒：《我認識的宋慶齡同志》。

員、新西蘭作家傑姆·伯特拉護送到延安。隨同前往的還有剛從希特勒德國逃亡出來的漢斯·米勒博士等幾名志願醫務人員。¹⁰⁴

隨著醫藥用品進入解放區，宋慶齡又安排許多外國著名的醫生同往。除了白求恩、米勒之外，還有柯棣華、巴蘇、法萊、布朗、哈里森等。

那是在一九三八年九月，宋慶齡在廣州會見鄧穎超，瞭解到解放區嚴重的缺醫少藥情況之後，在歡迎馬登·莫罕拉爾·愛德華（Madan Mohanlal Aral）大夫所率領的印度援華醫療隊時，她熱情鼓勵這個代表團到延安去進行參觀訪問。柯棣華和巴蘇就是這個代表團的成員。他們到延安後，就留下來參加八路軍的醫療服務工作。巴蘇任延安國際和平醫院外科主任。柯棣華到晉察冀根據地，在白求恩犧牲之後，繼任國際和平醫院院長之職。後來，柯棣華積勞成疾，在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九日病逝在崗位上。巴蘇則一直在為中國人民的醫療事業服務。

宋慶齡在「保盟」工作報告和不少文章中，對白求恩和柯棣華的逝世表示深切的悼念，對他們的國際主義精神給予很高的評價。白求恩在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二日逝世，二十日的「保盟」《新聞通訊》就以《一個為中國而鬥爭的戰士的犧牲》為題，向國內外作了報導，指出這對於中國人民來說，「是個沉痛的打擊」；中國人民永遠紀念他，「白求恩的工作將繼續下去」。¹⁰⁵

一九四三年七月，印度援華醫療隊的巴蘇有一次回國途經重慶，宋慶齡在家中親切地會

104 愛潑斯坦：《回憶保衛中國同盟的宣傳工作》。

105 《新聞通訊》第十一期，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五日。

見他。談到柯棣華在敵後根據地做出貢獻時，宋慶齡對柯棣華的逝世表示惋惜，沉痛地說：「這是一個大悲劇，巴蘇博士，我們失掉了最好的印度朋友之一……他還年輕，是我們共同的目标上的自我犧牲的工作者。中國永不會忘記他的。我國人民紀念這個為爭取中國的生存而犧牲了的偉大的國際主義者，我將永遠珍重他的夫人和小兒子。」¹⁰⁶之後，宋慶齡把柯棣華的事蹟，寫進「保盟」的工作報告，指出柯棣華「和他前任的白求恩大夫一樣，站在中國人民的遊擊區一邊，以國際主義精神，為戰勝疾病和死亡而生而死」。¹⁰⁷

在華東和華中的新四軍根據地，由於處在日偽頑的四面包圍下，沒有建立國際和平醫院的條件。但是從新四軍軍醫創建時候起，宋慶齡領導「保盟」給予大力支持，直到解放戰爭時期。關於這個全過程，創建並一直領導新四軍醫療工作的原新四軍軍醫處長、新四軍衛生部部长沈其震有系統而生動的回憶，¹⁰⁸「保盟」的報告及《新聞通訊》上也有許多報導。

一九三八年秋天，美國進步作家史沫特萊從武漢撤退到皖南，訪問新四軍。她瞭解到新四軍根據地軍民的醫藥器械奇缺，而國民政府根本不管的情況後，就向葉挺軍長建議爭取宋慶齡領導的「保盟」的支援。葉挺就派衛生部長沈其震前去香港會見宋慶齡。那是一九三八年冬天，沈其震將史沫特萊用打字機打在一方絲質白手絹上的信件縫在衣服裡，帶了一些自

106 《新華日報》一九四三年十月二十七日。

107 宋慶齡：《從香港到重慶》，載《永遠和黨在一起》第四十一頁，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108 沈其震：《許國以身長畫卷——回憶宋慶齡同志》，載《宋慶齡紀念集》第一百二十九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已拍攝的反映新四軍戰鬥生活和醫務工作實況的照片，連同染有斑斑血跡的日軍軍旗和有彈孔的鋼盔，以及日本士兵家信、護身符等戰利品，還有他自己拍攝的小型電影膠捲，經過化裝，秘密前往上海。到上海後，沈其震與「保盟」上海分會的耿麗淑、吳大琨等聯絡，舉辦了一個介紹新四軍戰績的展覽，然後去香港。

到了香港，沈其震經過廖夢醒引見很快地會見了宋慶齡。宋慶齡看了史沫特萊打在手絹上的那封信後說：艾格妮絲（史沫特萊的名字）的報導我在上海《密勒氏評論報》上已經讀過了，你們缺醫少藥的情況我是知道的。她接著說，抗日戰爭是一場正義的戰爭，保衛中國同盟已經在香港成立，國際上一些支持正義的團體和個人都在響應保衛中國同盟的號召，已經有不少募捐得來的醫藥器材和其他救濟物資已運到了香港，這次可以從香港帶回去一部分外，還可以從上海運回去一些，她已經通知上海的耿麗淑了。她還說，葉挺軍長是一位能征善戰的將軍，北伐他就一直沖在前面，現在又是他沖到最前面去了。談話中，宋慶齡流露出對過去北伐那股一往直前的勁頭很懷念；對當時蔣介石節節敗退，軍心渙散的勢頭，十分沉痛。最後她對沈其震說，她完全同意葉挺將軍的看法，軍醫工作對鼓舞士氣非常重要，軍醫工作做得好，勝利就有保證。

然後，「保盟」上海分會根據宋慶齡的指示，在中共江蘇省委和新四軍辦事處的配合下，積極開展援助新四軍的工作。不久，募捐到十萬多元，以及一批急需的手術器械和大量藥品，還有食品、被服、文化用品和救濟物資。其中有一種叫「白浪多息安」的最有效的消炎藥（磺

腋的前身)，是國外剛剛生產、國內還沒有用過的最新產品。這些醫藥用品和救濟物資，除由中共地下交通運送到新四軍根據地外，還由中共江蘇省委及「保盟」分會組織的慰問團帶去。這種慰問團曾組織了兩批，以群眾團體的名義到新四軍部隊去慰問，表達上海人民對新四軍指戰員英勇殺敵的敬意，並留下一些慰問人員參加新四軍。

一九三九年初春，沈其震向「保盟」中央寄來一份緊急報告，告知「前線醫院迫切需要兩萬條毛毯」，說去年冬天「由於嚴重缺乏寒衣和被褥，傷患們根本無法抵禦嚴寒，醫生無法盡到自己的責任」，以至已有幾千名傷兵在醫院凍死。¹⁰⁹於是，「保盟」決定，立即發起募集兩萬條毛毯的運動，支援新四軍。

《新聞通訊》從五月初的第三期起，一直到十一月的第十一期，多次發表文章，介紹新四軍去年冬天發生的事情，要求國外朋友「立即把輕便而暖和的毛毯送往中國」。六、七月份，宋慶齡主持起草的「保盟」成立第一年工作報告，向國外援華團體緊急呼籲說：「在九月份之前把兩萬條毛毯運給我們，將在今後長期的鬥爭中，救護十萬名傷兵。」宋慶齡為此而寫的《我們的第一年》一文，把募捐毯子運動的勝利結束，視為「保盟開展明年工作的良好開端」；希望這次運動能制止去冬「上千戰士差不多被凍死」的「慘事再現」。並指出：「全世界所有熱愛民主和同情中國的朋友們，你們對這次呼籲的及時回應，是對堅定反侵略前線的

男女戰士們表示團結的最好方法。」¹¹⁰

十月，宋慶齡《給外國機構的一封信》中，把毛毯又列為中國最需要的物資。

與此同時，宋慶齡還自力更生，委託中國工業合作社承制軍毯和棉衣。新四軍要求毛毯的緊急呼籲，通過宋慶齡和「保盟」的各種檔和宣傳管道，很快傳播到全世界；並且，由於宋慶齡的威望，立即得到踴躍的回應，真是一呼百應，許多援華團體和個人，紛紛向「保盟」運來毛毯及代購毯子的捐款。據一九四〇年二月統計，捐贈毛毯較多的有：美國醫藥援華會三千多條毯子與被褥、美國的中國民眾救濟會四大捆毯子與衣物、新西蘭左派圖書俱樂部一千〇一十條毯子、雪梨華僑救濟難民基金會等三個團體運來兩千兩百條優質羊毛毯。加拿大維多利亞醫療援華會提供二十六箱子毛毯。¹¹¹中國西北工業合作社，僅寶雞一地，就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生產供應軍毯五萬條，軍大衣三萬六千件。¹¹²捐贈毛毯數量大大超過了需要。「二萬條毛毯運動」獲得完全勝利。它不但拯救了大批新四軍傷病員的生命，而且具有深刻的政治意義。應該說，這是宋慶齡對新四軍和中國抗戰的一次特殊貢獻。

一九三九年四月，新四軍的醫療工作又出現新的情況，沈其震寫信給「保盟」中央，說

110 《新聞通訊》第六期，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五日。

111 《保衛中國同盟報告：一九三九至一九四〇年》第一百一十頁，香港一九四〇年版。

112 姜漱寰：《工合運動在西北》第二百零七頁，西北印刷合作社一九四〇年版。

由於天氣轉熱，蚊子又猖獗起來，新建了一個二百個床位的病房急需蚊帳和奎寧。¹¹³

「保盟」中央接信後，立即安排上海分會向新四軍提供一批緊急援助。上海分會協同中共上海地下黨，以上海地方協會的名義，派出第二批慰問團，攜帶所需要的緊急物資前往新四軍根據地，其中有六千碼蚊帳用料、二十萬片奎寧、四百聽煉乳、十二萬劑預防霍亂的疫苗、二千個消毒包等。慰問團中約有二十多名青年留下來，參加了新四軍。¹¹⁴

以上是一九四一年皖南事變前，宋慶齡領導「保盟」支援新四軍的主要情況。從中可以充分看出宋慶齡對新四軍抗日將士的感情之深。

宋慶齡支援八路軍和新四軍的事蹟，也表明她與共產黨的關係發展到一個新階段。

從某種意義上講，「保盟」與中共香港八路軍辦事處，實際上是一個工作班子。「保盟」實際工作的主持人，是八路軍辦事處主任廖承志。¹¹⁵他具體組織經武漢、重慶到各個根據地護送「保盟」分配給八路軍、新四軍的各種物資，同時，他又是宋慶齡在海外華僑中開展募捐工作的最得力的助手。八路軍辦事處的另一個工作人員廖夢醒，是宋慶齡的秘書，又是「保盟」婦女促進委員會的主持人；而「保盟」的財務主任，也是八路軍辦事處的成員——鄧文

113 《新聞通訊》第四期，一九三九年八月一日。

114 鄭正洪：《上海人民對新四軍的支援》，載上海《黨史資料》（叢刊），一九八五年第二輯。

115 徐舜英：《我們時代的一顆巨星——憶宋慶齡居留港滬時》，載《宋慶齡紀念集》第二百一十四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蔡建國：《廖公和蔡元培》，載《廖公在人間》第五十二頁，三聯書店一九八四年版。

釗。廖承志在黨內還協助廣東省委工作，指導廣東人民的抗日武裝鬥爭，對威名遠揚的曾生、王作堯領導的東江抗日遊擊隊，林鏘雲、吳勤率領的珠江遊擊隊，馮白駒領導的瓊崖遊擊隊和抗日總隊的組建、改編和發展，都親自指導。宋慶齡也曾親自與一些歸國華僑談話，動員他們參加這些遊擊隊。

宋慶齡不僅大力支持香港八路軍辦事處的工作，還保護它的活動。一九三九年秋天，一位在新加坡被捕過的新共華僑到香港，不慎在與八路軍辦事處接觸時，被港英當局跟蹤員警所發現，使八路軍辦事處的一個秘密辦事機關暴露。該機關被搜查，譚樂華等工作人員被捕。共產黨考慮到這次破壞是反動派配合搞遠東慕尼黑陰謀，針對辦事處負責人廖承志的，不便出面交涉，就請宋慶齡出面營救。宋慶齡即與當時正路過香港去重慶上任的英國新任駐華大使交涉，終於使八路軍辦事處的被捕者在一星期後交保獲釋。¹¹⁶

周恩來更是關心、支持「保盟」的工作。他「特地當面告訴英國駐華大使卡爾將軍說：由於八路軍、新四軍英勇抗敵，贏得我國海外廣大華僑的欽佩，紛紛捐助物資、藥品和款項，因此，我們需在港設立辦事處接收，請轉告港督加以關照」。¹¹⁷此外，他不僅幫助宋慶齡收集八路軍抗戰和延安及各個抗日根據地醫療、難民、孤兒的情況，還具體說明安排援助物資的接運工作。一九三八年底，當一批海外援助物資到達香港時，在桂林的周恩來就積極配合宋

116 譚樂華：《宋慶齡同志營救我們出獄》，載《長江日報》一九八一年六月四日。

117 連貫：《我們敬佩的廖公》，載《廖公在人間》第三十一、三十二頁，三聯書店一九八四年版。

慶齡，幫助王安娜到香港和上海較快地接運了這批物資。後來，王安娜作為「保盟」代表從海防港到中國境內為「保盟」押運物資時，還為八路軍押運過物資。

三、不流血的鬥爭

「保盟」為執行公正分配的原則，給八路軍和新四軍以必要的援助，就必須與國民黨頑固派「溶共」和封鎖的政策進行一系列嚴重的鬥爭。這種鬥爭是不流血的，雖然沒有刀光劍影，但卻相當激烈、複雜。為此，宋慶齡花費了很多精力。

一九三八年，同情中國抗戰的美國軍官埃文斯·卡爾遜上校，曾憤怒地向愛潑斯坦談起在西安與國民黨「封鎖將軍」蔣鼎文的一次談話。當時卡爾遜剛從八路軍抗日根據地考察回來，他對蔣鼎文提出把醫藥送到遊擊區的必要性時說：「那裡的傷兵要是沒有藥品是會死的。」蔣鼎文卻冷冷地回答說：「沒關係，死得越多越好！」¹¹⁸

實際上，「保盟」的每一筆捐款、每一批物資到達共產黨手中，都要經過一場驚心動魄的鬥爭，而且「保盟」也因此經常遭到日偽及國民黨頑固派的威脅和破壞。

為了衝破封鎖和阻撓，宋慶齡常常以「孫夫人」的名義，親自在寄送的物品上簽字，並且一般都派外國人押運。但是，募捐物資仍然不斷地遭到國民黨軍政機構的扣押。最嚴重的

事件發生在一九四〇年冬天。

當時，正是八路軍在華北抗擊日本殘酷掃蕩，戰事最頻繁，鬥爭最艱苦的時期，而白求恩主持的國際和平醫院及所屬各個醫療隊雖已有相當發展，但醫藥和醫療器械極其缺乏。白求恩對宋慶齡派去現場瞭解醫院情況的王安娜說：「我們缺少最必要的器材，不用說，還缺少X光透視機、輸血設備。其他各種醫藥用品也少得可憐。這個醫院的情況，你現在已親眼看到了。我們阻止了日軍的進擊，但是，這付出了許多人的生命。」¹¹⁹

恰恰在這個時候，中國紅十字會受到壓力，停止籌集遊擊區的經費，對國際和平醫院的支援任務，就完全落到了「保盟」身上。於是，宋慶齡決定把「保盟」積累了幾個月的足夠醫院一年之用的重要藥品，還有遊擊區得不到的貴重的手術器械和研究用的儀器，總共六噸之重，運送到國際和平醫院。為了路上順利，宋慶齡採取了一系列措施：由兩位英國援華救濟會的成員伊法特·巴傑爾（Barger）和菲利普·萊特（Wright）護送，裝載在國際紅十字會的卡車裡；經過同國民黨的各種官樣文章進行許多鬥爭之後，才取得蔣介石的許可證。

但是，這批物資在運到陝西三原國民黨軍隊包圍陝甘寧邊區的封鎖線上時，卻受到阻攔。西安當局拒絕為這批物資發放去北方的通行證。巴傑爾和萊特只好先把救濟物資存放在當地的英國教堂裡，然後與西安國民黨當局進行交涉。他們不同意把這批藥物運到遊擊區的醫院

去，提出應當交給國民黨的中央軍醫署。交涉沒有結果。為盼望好轉，巴傑和萊特先到河南及山西的國民黨部隊中分發一些物資給前線的部隊後，四月底又返回西安繼續交涉。宋慶齡和「保盟」中央也為此作過努力。然而，就在談判繼續時，國民黨竟以「破壞傳教活動」相威脅，強迫傳教士交出這批醫藥物資。可是後來這批物資並沒有運到重慶中央軍醫署，卻發現在西安私人藥房裡以黑市的價格出售。¹²⁰

不僅如此，國民黨當局連醫生也不許進入遊擊區。捷克斯洛伐克的外科醫生愛爾文·吉斯赫，是國際上著名的反法西斯新聞工作者伊剛·愛爾文·吉斯赫的弟弟，是在西班牙服役後志願到中國來參加抗日的醫務人員。儘管「保盟」作出各種努力，國民黨仍是堅決不讓他通過封鎖線進入抗日遊擊區。

這些倒行逆施的做法，使宋慶齡深感痛心。她既為共產黨抗日部隊得不到這批極其急需的珍貴的醫藥用品而惋惜，又為國民黨幹出這種親痛仇快的蠢事而痛心。因為這樣不僅削弱中國抗戰的力量，而且勢必影響外國朋友繼續援華的熱情。當時，她給王安娜的信中說：「實際上政府阻止這些醫藥用品的輸送。家醜不可外揚，難道我們能夠對外國朋友說明這個情況嗎？我本來還沒有下決心把實際情況告訴他們，不過，連英國的救援機構的成員都被阻擋

120 宋慶齡：《救濟工作和政治——答宋子文先生》，載《永遠和黨在一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三三年版；愛潑斯坦：《回憶保衛中國同盟的宣傳工作》，載同一書。

不讓通過封鎖線，我怎麼還能瞞得住呢？」¹²¹

在這種嚴酷的形勢下，更迫使宋慶齡想方設法地給八路軍、新四軍以更多的幫助。一九四一年十一月，當她得知美國尤金·邁耶醫生決定率領醫療隊來華工作時，她立即給美國援華委員會寫去兩封信，動員該醫療隊到遊擊區工作。美國援助中國委員會執行秘書蜜德莉·普賴斯及盧思先生十分同情遊擊區的處境，同意宋慶齡的意見，表示他們將盡一切努力，加強對遊擊區的援助：「遊擊隊抗日有多久，我們就應該援助他們多久。」他們及時向邁耶轉達宋慶齡的意見，並作了相應的安排。¹²²雖然邁耶收到信後兩天爆發了太平洋戰爭，他被調到美國空軍部隊服役，因而未能如願成行，但宋慶齡和美國朋友關心遊擊區的苦心，仍是很感人的。

既然向八路軍援助醫藥用品已經不可能，「保盟」就把「外國為醫院募集的捐款，只交給駐重慶的八路軍辦事處。這樣做，至少可以保證把外國寄來的錢全部用在華北的傷病員和必需救助的人身上」。¹²³

四、支持中國工業合作運動

支援「工合」運動也是「保盟」的一項重要工作。因為它最符合國外捐助者的願望和「保

121 參見〔聯邦德國〕王安娜：《中國——我的第二故鄉》第三百八十六頁，三聯書店一九八〇年版。

122 傅元朔：《從宋慶齡同志抗日時期給美國友人的信談起》，載《光明日報》一九八一年八月五日。

123 參見〔聯邦德國〕王安娜：《中國——我的第二故鄉》第三百八十六頁，三聯書店一九八〇年版。

盟」的宗旨——「援助中國，使之能夠自助」。¹²⁴這是把接受外援與自力更生結合起來，並使前者為後者服務的一條重要途徑。

「保盟」與「工合」實際上是一個目標、兩種途徑。前者是直接用於抗日戰爭造成的災難救護，後者則通過發展經濟來支援抗戰。後來「工合」與「保盟」一樣，果真成為國際友人和海外華僑援助中國抗戰的重要紐帶，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生產合作運動的先驅」，一支支援中國抗戰的獨特的經濟力量。在中國人民與日本侵略者浴血奮戰的艱苦歲月，它為供應戰時的軍需民用，支持長期抗戰，特別是援助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和根據地的鬥爭，做出了重要的貢獻。而中國的「工合」運動能取得這樣的成就，是與宋慶齡的大力支持分不開的。

舊中國的工業本來很落後，又大多集中在東部沿海一帶。「七七事變」以後，日本帝國主義大舉進攻，這些地區全部淪於敵手，很多工業毀於戰火，數以千計的熟練工人在社會上到處流浪……

在這種情況下，能否動員人力物力在後方重建工業，發展生產，供應戰時的軍需民用，是關係到能否堅持長期抗戰、爭取最後勝利的重要問題。同時，解決千百萬流離失所、饑寒交迫的難民、傷兵的勞動就業、安定後方社會秩序，也是亟待解決的問題。對此，腐敗的國民黨政府是束手無策的。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在上海的斯諾夫婦和路易·艾黎目睹上海許多工廠遭到狂轟濫炸，就議論了一個「在非敵佔區發起一個建立一連串的小工業合作社的想法」，「給人們一個機會自救和救亡」。¹²⁵於是，先由路易·艾黎起草了方案，三個人又對方案作了修改，然後請上海《密勒氏評論報》的鮑威爾印成小冊子，在上海各界人士中散發，立即得到「星一聚餐會」中的愛國人士的擁護。這個「星一聚餐會」，是中共地下黨領導的救國組織，其中有胡愈之、劉湛恩、鄭振鐸、王任叔、王芸生、薩空了等人。於是他們就組織起了中國工業合作社設計委員會，並且邀請農產調整委員會工作的盧廣綿、上海電力公司工程師吳去非、林福裕等人，共同擬定了在中國發展工業合作社的初步計畫，提出建立三萬個工業合作社，使千百萬人得到新的工作，並使工業生產恢復到戰前水準的目標。

中國「工合」運動，就這樣發起了。但是正如斯諾所說：「如果沒有宋慶齡和英國駐華大使阿奇博爾德·克拉克·克爾爵士這兩位十分熱心人士的發起贊助，『工合』是永遠辦不起來的。」¹²⁶

路易·艾黎和斯諾立即把「工合」計畫通報給宋慶齡。她對此「百分之百地支持」，並且

125 (美)路易·艾黎：《對埃德加·斯諾的回憶片斷》，載《光明日報》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三日；(美)埃德加·斯諾：《復始之旅》第二百三十九頁，新華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126 (美)埃德加·斯諾：《復始之旅》第二百三十九頁。

為路易·艾黎等的設想「深受感動」，高興地當了「工合」運動的「保證人」。¹²⁷

深謀遠慮的宋慶齡早有幫助人民生產自救的思想，一九三七年四月，即抗戰爆發前夕，她在《儒教與現代中國》一文中指出，在蔣介石、宋美齡所大力鼓吹的「新生活運動」中「找不到任何新東西，它也沒有給人民任何東西」。「因此，我建議用另一種運動來代替這個學究式的運動，那就是，一種通過生產技術的改進以改善人民生活的偉大運動。」所以，宋慶齡支持「工合」是有她的思想基礎的，而且，在她的影響下，宋子文也「百分之百」地支持「工合」運動。她還把宋子文介紹給斯諾、王安娜等人交朋友。經過同他們商談後，宋子文以個人的身分答應給實施這一計畫以財政上的援助。¹²⁸斯諾同意希恩對宋子文的評價，認為他雖然站到蔣介石集團的一邊反對革命，「但是他在政治上的矛盾心理繼續存在。在感情上他同情他喜愛的姐姐孫逸仙夫人，她是他們家中唯一的革命者。由於擁有萬貫家財，他無疑會味著良心幹些事，為了減輕內疚，他不時幫助慶齡，甚至通過她暗中幫助左派的事業」。¹²⁹宋子文還給他們出主意說，這項計畫「最好取得蔣介石的正式同意」，並說可以通過他的兩個姐妹（即蔣介石夫人宋美齡和財政部長夫人宋藹齡）去做蔣介石的工作。「如果得到政府正式的許可

127 (美) 路易·艾黎：《對埃德加·斯諾的回憶片斷》；(聯邦德國) 王安娜：《中國——我的第二故鄉》第一百九十頁，三聯書店一九八〇年版；(美) 埃德加·斯諾：《復始之旅》第二百四十二、二百四十四頁。

128 (聯邦德國) 王安娜：《中國——我的第二故鄉》第一百九十頁，三聯書店一九八〇年版。

129 (美) 埃德加·斯諾：《復始之旅》第二百六十四頁。

檔，就易於得到更多同盟軍的協力。」¹³⁰

斯諾和艾黎等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這個「工合」運動要開展起來，必須得到蔣介石和孔祥熙的支持。因此斯諾等又通過英國駐華大使館青年秘書約翰·亞歷山大，爭取駐華大使阿奇博爾德·克拉克·克爾爵士的支持。這位大使親自約見斯諾，詳細聽取了「工合」計畫，共同研究開展這個運動所需要的條件，最後答應去漢口說服蔣介石及孔祥熙批准這個計畫。

但蔣介石和孔祥熙對「工合」態度冷淡，孔祥熙甚至表示「不予考慮」。宋美齡由於受宋慶齡的影響，對「工合」，「表示贊許」，並保證說服政府支持這一計畫。當「工合」運動遭到孔祥熙拒絕之後，「氣得蔣夫人哭了一場，旋激起孔夫人之同情，為此，孔夫人當著孔院長閣下，表現了卓著功能的『河東獅吼』，迫使孔院長乖乖地聽命，改變主意，全力支持『工合』」。¹³¹

不過，促使孔祥熙支持「工合」的主要原因，是他與夫人都看到了「工合」能使他們有利可圖。因為「『工合』全部採取使他私人銀行能進行剝削的辦工業方式」，並且可以從政府撥款中得到數量可觀的回扣。¹³²

與此同時，艾黎和上海銀行行長徐新六將「工合」計畫在武漢徵求中共代表團周恩來和博古的意見。他們積極支援「工合」並提出「工合」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以促使蔣介石

130 〔聯邦德國〕王安娜：《中國——我的第二故鄉》第一百九十頁，三聯書店一九八〇年版。

131 曹雲霞：《宋慶齡與宋美齡》，載香港《鏡報》雜誌一九八一年第四期。

132 路易·艾黎：《工合運動記述》，載《文史資料》第七十一輯。

抗戰，不讓他投降，盡可能多地爭取美國及其他國家的支持等。¹³³博古還幾次幫助艾黎制定有關的政策，並建議把武漢的許多工業遷到西北去。

於是，經過英、美等國駐華大使推薦，國民黨政府正式任命艾黎為中國「工合」、「首席技術顧問」。孔祥熙答應提供行政經費和貸款五百萬元，作為「工合」的基金。

一九三八年八月五日，「中國工業合作協會」總會在漢口成立。孔祥熙任理事長，宋美齡任名譽理事長，路易·艾黎為技術顧問。二十名理事中，有國民黨方面的王世傑、邵力子、翁文灝、張治中等人，共產黨方面有林祖涵、董必武、鄧穎超，還有各界著名人士沈鈞儒、黃炎培等。「工合」與「保盟」一樣，是一個統一戰線性質的機構。實際工作由艾黎、劉廣沛（總幹事）和盧廣綿等進步人士組成的班子主持。

「工合」成立後，宋慶齡和「保盟」就在國際上廣泛地為它宣傳，呼籲支持。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五日，即「工合」總會在漢口成立後十天，宋慶齡對在美國紐約召開的世界青年大會作廣播演說，向世界人民介紹中國的「工合」運動。參加這個大會的有五十二個國家代表。從這次演說中，可以看到，宋慶齡對「工合」產生的時代背景、性質、作用的瞭解和闡述，是非常透徹的。

她說，日本侵略毀滅和攫取了我們百分之七十五的機器工業，它使我們百多萬的產業工

人失了業。但是「我們的人民，我們的政府，都已決心即在戰爭中，也要將日本所毀滅的生產力重建起來」。她指出建立工業生產合作社的作用是：「能夠維持經濟穩定，能夠維持內地市場，避免鄉村的紊亂與匪患，……工業合作社能夠利用一切的失業工人，使我們的士兵獲得衣食，並且免除饑荒，……工業合作社能夠支持長期抗戰，使日本對於占得城市絲毫無利可圖。」

最後，她向參加大會的各國青年呼籲：「我們請求你們向你們的政府陳請，將機器與原料賒賣給我們的工業合作社，使我們能夠幫助我們的人民實行經常生產救濟的各種辦法。我們請求你們的銀行家貸款給這些工業合作社，請求你們的青年志願人士遣派技術人員到中國來，我們的政府將歡迎這一切你們所能給予這個進步運動的支持。」¹³⁴

在以後宋慶齡所寫的文章、函札和報告、演說中，又多次對「工合」作了類似的介紹和呼籲。在「保盟」的每年工作報告和《新聞通訊》上，更是詳細地介紹「工合」運動開展的情況和取得的每一項成績。

正是由於宋慶齡和「保盟」這樣的大力宣傳和呼籲，「工合」很快成為舉世矚目的新生事物，引起國內外人民廣泛的同情和支持。「工合」之樹的生長，獲得了肥沃的土壤。一個個生產合作社，在廣大的非敵佔區，星羅棋佈地建立起來。到一九四二年六月，全國「工合」達

一千五百九十個，生產種類有紡織、服裝、鞋帽、日用百貨、食品加工、文具、印刷、醫藥、化工、五金、機器、採礦、交通等五十餘種。它們安置了千千萬萬個難民，生產了大量軍需品和民生用品，發揮了安定後方秩序、支援前線作戰的作用。

但是，中國「工合」運動的發展，並不是一帆風順的。它幾度面臨夭折的危險。宋慶齡為鞏固發展「工合」運動，曾做出了巨大貢獻。

「工合」開始不久，孔祥熙就違背諾言。由於作為對艾黎等抵制他的敲詐（從撥款中索取高額回扣）的報復，他在開始撥給「工合」一筆數目很小的款項後，即停止撥款。在此期間，艾黎和他的工作人員不僅要負擔自己的生活費用，還要拿出個人的積蓄資助第一批試辦的合作社。艾黎對斯諾沮喪地說：「我破產了，我的人很不高興，都快要離開我了。」¹³⁵斯諾到香港與宋慶齡商議後，把宋子文資助的二十萬元匯給艾黎，幫助艾黎渡過難關，而且促使孔祥熙很快就提供了一些貸款。因為孔祥熙害怕不這樣會失去他在「工合」運動中的地位。

接受這件事的教訓，斯諾在宋慶齡的提議和幫助下，一九三九年一月，在香港組織了「工合」國際委員會，向國外大力宣傳「工合」，籌募支持「工合」發展的獨立基金。香港主教羅奈爾得·霍爾任委員會主席，宋慶齡任名譽主席，陳翰笙為執行秘書，斯諾、艾黎、普律德、宋子文等為委員。艾爾達·普律德（Ida Pruitt）是美國人，原在北京協和醫院工作，抗戰爆

發後結識斯諾和艾黎，參與「工合」運動。新中國成立後，在美國繼續從事美中友好活動，是美中友協負責人之一。

建立國際委員會後，宋慶齡對「工合」的支持除了對外宣傳和呼籲之外，還進一步採取組織行動，著手在國外推動建立支持中國「工合」的促進委員會。

首先熱烈響應的是菲律賓的華僑，「他們的情緒最熱烈，捐獻也最慷慨」，一再邀請宋慶齡前往為「工合」籌款。¹³⁶宋慶齡委託斯諾夫婦前去工作。一九三九年五月，在馬尼拉建立菲律賓「工合」促進委員會，由美國駐菲律賓專員夫人塞雅擔任名譽主席，博雷博士為主席，但諾爾為總幹事，委員有一百多人。成立伊始，塞雅夫人即在馬尼拉電臺發表廣播演說，呼籲菲律賓及美國等各界人士給中國「工合」以實際的援助。當地華僑立即回應，菲律賓華僑婦女救濟協會等團體，立即籌募了二十餘萬元捐款匯交宋慶齡收轉中國「工合」。¹³⁷一年多時間裡，菲律賓僑胞即向該會捐助了幾十萬元。一九四〇年，路易·艾黎曾到菲律賓演說，宣傳「工合」，受到熱烈歡迎，不到兩星期，他回國時帶回捐款達十五萬元之多。

美國是宋慶齡工作的重點。宋慶齡委託「工合」國際委員會秘書普律德直接回美國組織「工合」促進委員會，羅斯福總統夫人為名譽主席，太平洋艦隊司令雅納爾任主席，普律德擔任秘書，委員有美國陸軍部長史汀生等百餘人。海倫·斯諾回國後曾任該會副主席。抗戰期間，

136 [美]埃德加·斯諾：《復始之旅》第二百四十七、二百五十二頁。

137 《工合之友》第一卷，第七期，第二百四十五頁。

美國友人及華僑給中國「工合」的援助達五百萬美元。其中「美國援華工業合作促進委員會」一九三九至一九五一年為中國籌集了三百五十萬美元。¹³⁸

英國倫敦也成立「英中合作發展公司」，專門援助中國的「工合」運動。工黨領袖伊莎貝爾·克里普斯夫人為名譽主席，工黨政府交通運輸大臣、國會議員巴恩斯任主席，英國《新政治家和民主》雜誌編輯吳德滿任秘書。伊莎貝爾·克里普斯夫人也是「英國聯合援華會」的主席，向「保盟」提供大量捐款和物資。她的丈夫斯特拉德·克里普斯爵士，是邱吉爾政府中的一位部長，他在此前曾到香港，要求拜見宋慶齡。宋慶齡邀請愛潑斯坦等「保盟」工作人員作陪，在家中盛情予以款待，並且坦率地交換了意見。他懷著友好的感情離去，回國後與妻子從事中英友好事業，支持宋慶齡的工作。抗戰期間，「英中合作發展公司」向中國「工合」捐款十萬英鎊以上。

此外，新西蘭、澳大利亞等國也都先後成立援助中國「工合」的組織。

據陳翰笙統計，「工合」國際委員會在香港兩年多時間裡，「接受了國外華僑和國際友人的捐款兩千多萬元」。¹³⁹

香港淪陷前，宋慶齡還親自主持了「嘉年華會」為「工合」籌款。她這次活動也是由「保

138 《旅華歲月——海倫·斯諾回憶錄》（MY CHINA YEARS, A Memoir by Helen Foster Snow）第三百〇九頁，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八五年版。

139 陳翰笙：《談談孫夫人的高尚品質》，載《宋慶齡紀念集》第一百一十七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盟」和「工合」國際委員會聯合舉辦的。

嘉年華會採取民眾娛樂集會的方式，會場上布置各種遊藝活動及精彩的演出，展出「工合」產品和各地「工合」戰士反對日本侵略的資料。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嘉年華會在香港加路連山道南華體育場旁的海軍操場舉行開幕式。宋慶齡邀請何香凝、柳亞子、孫科及美國的福克斯等許多中外著名人士參加。大會主席威爾遜致詞後，宋慶齡用英語發表演說。她針對國民黨政府在「皖南事變」後的倒退行為說：「抗日戰爭是中國的人民戰爭，不是任何一個政黨可以包辦的。真抗戰人民歡迎，假抗戰人民唾棄。」當時人如潮湧，盛況空前；場上萬頭攢動，熱烈歡呼鼓掌，場面十分動人。有一個英國婦女豎起大拇指說：「講得好極了！瑪丹（法語：『夫人』）真是了不起！」¹⁴⁰

這次活動，會期三周，每天都有大批人士參加，不僅籌募到大量捐款，還極大地擴大了「工合」的影響。

「工合」國際委員會為「工合」運動獨立籌款活動的開展，以及「保盟」給「工合」的直接撥款，解決了「工合」生存及發展的經濟基礎，但是政治上的鬥爭並沒有停止。「工合」事業的興旺發達，引起國民黨中統特務頭子、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陳果夫及其弟弟、國民黨中央秘書長陳立夫集團的垂涎。他們見「工合」獲得大量國外捐款，就把「工合」視作「又一

個敲詐物件」，一再揚言要改組「工合」總部，以便「安排更多的國民黨遊手好閒者在總部裡任職領薪」。¹⁴¹

宋慶齡決心利用「二陳」與宋美齡及孔祥熙夫婦之間的矛盾，進行鬥爭，保護「工合」事業。一九四〇年四月，宋慶齡與宋藹齡、宋美齡一起訪問四川時，重點參觀、視察重慶和成都的工業合作社，三姐妹表示要共同為「生產自救」做出貢獻，顯示了工合事業有強大的後盾，阻止了陳氏兄弟的公開破壞。但是「二陳」並不甘心，他們設立「合作社管理局」，企圖「管制」合作社，「慢慢地窒息它」。¹⁴²於是，宋慶齡請斯諾從菲律賓賓回來，幫助艾黎與管制局作鬥爭。斯諾給在美國的宋子文寫了一封信，把情況詳細告訴他，請他進行調解，理由是一旦「工合」轉到了陳氏兄弟手裡，我們就會失去美國輿論的同情，失去美國的支持。宋子文很重視這件事，立即給蔣介石和宋美齡打了電報，談了這方面的意見，使「工合」有一段時間頂住了合作社管理局要「合併」它的企圖。¹⁴³

與「保盟」一樣，宋慶齡對陝甘寧邊區和八路軍、新四軍根據地的「工合」運功的支持，付出了更多的心血，她把這視為支援八路軍、新四軍抗戰的又一重要管道。

據斯諾回憶，延安起初對「工合」有誤解，懷疑是「政治上異端的資產階級」的組織。

141 (美) 埃德加·斯諾：《復始之旅》第二百五十九頁，新華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142 (美) 埃德加·斯諾：《復始之旅》第二百七十二頁，新華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143 (美) 埃德加·斯諾：《復始之旅》第二百五十九頁，新華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後來，經過斯諾給毛澤東寫信解釋，全面介紹「工合」情況：「『工合』是怎樣辦起來的，它的宗旨是什麼，用哪些方法辦『工合』，以及『工合』怎樣幫助遊擊戰爭，並把一份『工合』組織章程附寄給他。」¹⁴⁴才把那裡原來的「生產合作社」轉到「工業合作社」的軌道上來。在宋慶齡看來，只有通過「工合」，「保盟」才能更好地支援延安，支援遊擊區。正如任「工合」國際委員會秘書的陳翰笙所說：「孫夫人所以幫助這個委員會，是因為可以通過這個委員會吸收國內組織工業合作社的款項和器材，防止重慶財政部收到國外的捐款而不發給延安和其他抗日根據地。」¹⁴⁵

但是，解放區的「工合」是在極為困難的條件下產生和發展的。因為解放區的工業基礎更為薄弱，交通不便，經費不足，技術落後。再加上國民黨政府及銀行給「工合」的一些經費和貸款，幾乎全給了國統區的「工合」。據一九四〇年初的調查，當時解放區「工合」的數量占全國六分之一，而貸款僅占四分之一。¹⁴⁶所以一九三九年底，「由於設在重慶的『工合』總會不再提供援助，延安的『工合』組織瀕於破產」。¹⁴⁷

這時，宋慶齡即派斯諾以「工合」國際委員會代表的身分，持宋子文給委員長西北行營

144 同上書，第二百八十四頁，新華出版社一九八四年。

145 陳翰笙：《談談孫夫人的高尚品格》，載《宋慶齡紀念集》第一百一十七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146 《新華日報》一九四〇年二月二十四日。

147 [美]埃德加·斯諾：《復始之旅》第二百八十五頁，新華出版社一九八四年版。

司令長官蔣鼎文和第一軍軍長胡宗南的信，以視察原來由孔祥熙親自批准在延安建立的軍需廠的任務，獲准去延安，幫助那裡的「工合」設法渡過難關。與此同時，在宋慶齡的關懷下，「工合」國際委員會把馬尼拉的捐款十萬元一次撥給了陝甘寧邊區的「工合」。邊區政府也採取緊急措施，籌措貸款，終於使「工合」得以生存下來，並且使生產在一年之內增加四倍，「工合」的經營範圍也擴大了，有了鐵礦、煤礦、鐵工廠、小機器製造廠、製藥廠、運輸站和兩個小油井。到一九四二年，延安的「工合」機構成為全國最大的地區總分會，擁有的工人相當於中國其他地區「工合」工人的總和。直接為八路軍服務的延安「工合」的軍需廠，成為全國最大的工廠，對於堅持敵後抗戰，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另外，晉東南、晉西北、晉冀魯豫、浙皖、粵贛等八路軍、新四軍的各個根據地，也都發展了「工合」。一九四〇年以後的邊區及敵後根據地的「工合」，主要依靠宋慶齡領導的「保盟」和「工合」國際委員會，從美國、英國及華僑募捐來的資金維持。珍珠港事件之前，菲律賓和南洋華僑籌集了一百多萬元支持邊區的「工合」。為防止國民黨竊取國外捐贈給中國「工合」的捐款，香港「工合」由陳翰笙經由上海銀行，通過廖承志和唐明照，把捐款直轉延安交給李富春。¹⁴⁸

宋慶齡和「保盟」支持「工合」，並通過「工合」支援八路軍、新四軍的方式是多種多樣的，事蹟是不勝枚舉的。

一九三九年，宋慶齡曾委託以國統區寶雞為中心的西北「工合」，承制棉衣十萬件，送交西安八路軍辦事處轉運前方。「工合」戰士滿懷抗日激情，提出「趕制萬件棉衣，換取敵人萬顆頭顱」的口號。五月，「保盟」又應新四軍的緊急需要，在提供現成的蚊帳同時，將二千元港幣的捐款，用於在皖南新四軍基地建立一個蚊帳生產合作社，這在根本改善新四軍蚊帳供應上，起很大的作用。為了從根本上解決八路軍、新四軍及全國抗日戰士的軍毯供應，一九四〇年二月，「保盟」又撥款支援「工合」成立織毯合作社，生產出的毯子供應國際和平醫院下屬各單位；還支援西北「工合」辦事處，生產繃帶、藥棉、擔架粗帆布、汗衫等，這些產品也提供給國際和平醫院。¹⁴⁹為此，廣大「工合」戰士，響應宋慶齡的號召，開展了「織造百萬軍毯，支援前方將士」的運動。在抗戰期間，各地「工合」供應的軍毯「不下五百萬條」。¹⁵⁰不僅滿足了八路軍、新四軍的需要，甚至「國民黨軍隊用的軍毯差不多都是『工合』供應的」。¹⁵¹

宋慶齡和「保盟」採取的這一系列措施，既有效地支持了「工合」的生產事業，又直接支援了抗日戰爭。在艱苦環境中堅持抗戰的抗日根據地的軍民，真正嘗到了「工合」的甜頭，衷心感謝宋慶齡、斯諾、艾黎等為「工合」事業所做的工作。毛澤東在一份關於中國「工合」的聲明中說：「在幫助恢復我們後方的工業方面，它們所做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工合』在敵

149 《保衛中國同盟報告：一九三九——一九四〇年》第七頁，香港一九四〇年出版。

150 陳翰笙：《中國工業合作運動的過去與將來》第十六頁，太平洋學會美國分會出版。

151 路易·艾黎：《保衛中國同盟與「工合」》，載《永遠和黨在一起》第七十五頁，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後戰區最為需要，而且得到我們的軍隊、人民和政府的最熱烈的歡迎。我們用這種方法達到幾層目的：（一）阻止敵貨從被占區向遊擊戰爭農村根據地滲透；（二）利用中國的原料和資源為我們自己的工業服務，防止日本對之掠奪；（三）創立遊擊戰爭經濟上自給自足的根據地，以支持持久戰；（四）培訓失業人員和不熟練勞工，使日本不能利用他們來反對我們；（五）供應農民以所需的工業品來交換糧食，維持農村的繁榮。」¹⁵²

毛澤東的這個總結，對中國「工合」在抗戰中的作用，講得非常全面，非常透徹。實際上也是對宋慶齡等「工合」領導人在這項事業中所做作的貢獻的高度評價。

一九四〇年，新四軍葉挺也曾給「工合」國際委員會寫信表示：「我們衷心感謝你們經常捐贈和幫助皖南遊擊區建立工業合作社……這些工業使我們區裡的難民得以生產自救。它們幫助我們利用本地的原料，使不致落於敵人之手。因此，我們能夠抵擋敵人貨物之侵入，並有可能自給自足，使皖南人民得到了好處。」¹⁵³

但是，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當宋慶齡領導「保盟」，支援「工合」，給中國的抗戰事業，尤其是八路軍、新四軍的鬥爭以有力的支援的時候，國內外政局突變，接連發生了「遠東慕尼黑」、「皖南事變」、「太平洋戰爭」和香港淪陷等一系列事件，因此，中國抗戰以及「保盟」、「工合」的事業，隨之又進入更加艱苦的歲月。

152 轉引自（美）埃德加·斯诺：《為亞洲而戰》第三百三十一、三百三十二頁，美國蘭多姆出版公司一九四一年版。

153 路易·艾黎：《保衛中國同盟與「工合」》，載《永遠和黨在一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